

【宋史研究】

北宋中期陕西路军事财政新变

——以仁宗朝宋夏三战为中心

薛政超 岳潇岚

【摘要】在宋夏战争新形势的推动下,宋仁宗朝的陕西路军事财政责任上移,朝廷建立“中央—地方”的财政供给体制,使之成为陕西路军事财政融入国家财政的重要阶段。主政者以扩权与分工为基本原则,构建以选近要特置的陕西路都转运使、本路转运使与言官、清要和财计等朝官组成的临遣系统,分别负责“经画”“奉行”“督办”等事务的三位一体军事财政管理体系。在此基础上以度支为主、内藏为辅承担起本路供军主责并较大幅度地增加财政供给,同时将之与“要害”战区、纵向防御战略相结合优化军需供给模式。而西夏立国带来的国防压力与财困冗费造成的内政忧患之间的平衡,以及由和转攻战略与士人轻夏思想之间的纠缠,共同制约奠定了“既增又限”“省费供军”的财政路线的政策基调。仁宗朝陕西路军事财政新的变化,凸显了北宋陕西路军事财政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阶段特征与内在逻辑。

【关键词】军事财政;宋夏战争;宋仁宗;陕西路

【作者简介】薛政超,江南大学历史研究院教授(江苏 无锡 214122),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史、中国古代经济史(云南 昆明 650091);岳潇岚,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津),2023.10下.46~57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财政体制变革与地方治理模式研究”(17ZDA175)、云南大学一流大学建设“富民社会”理论创新高地及中国经济史创新团队项目阶段性成果。

北宋诸朝以相应边路为支撑的军事财政体系前后发生了重要变化,其主线是由以转运司统筹、本地支给的有限财政,逐渐转变为由中央统筹、全国供给的优先财政,呈现出边路地方军事财政融入国家财政的整体趋势。这在陕西路所展开的历次宋夏战争及其军事防御背后的财政运转中有较为典型的体现,而仁宗朝康定、庆历间宋夏三战^①财政政策新的动向则集中反映了这一前后转折变化的中间过渡形态。学界对之关注较多,所涉及的财政问题多为后勤补给,亦间有阐发其财政结构和折博务等财政机构,^②但对其军事财政体系的整体构成及作为前后过渡形态的承继创新与阶段特点,则少有揭示。本文拟以这三次战争前后陕西路军事财政为典型,揭举宋仁宗朝在中央主导下构建三位一体管理体系和朝廷增量与优化并举承担供军主责的实况,同时考察导引此时军财新变的诸矛盾因素及其历史逻辑,进而通过纵向比较呈现其承前启后的阶段性特征。

一、扩权与分工:中央主导构建三位一体军事财政管理体系

宋仁宗康定、庆历年间,西夏有预谋地对宋陕西路发动战争,导致宋夏三年三战,较之前双方战事其规模更大、冲突频率更高,因而需要拥有更大事权的财政管理体系来负责军财统筹。宋廷为此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举措,最要者选近要特置陕西路都转运使命以“经画”之责,由此扩大原属本路转运使的实地调研草拟计划之权;次则给常设之转运使重新定位,一般不再向三司等中央财计部门提出“乞办”事务或政策建议,而是在特置或临遣专使的统一协调下专职“奉行指挥”;同时派遣重要朝官入陕,专管督促军粮供给与城寨修筑等急要财政事务,以弥补转运使财政调度职能之不足。此举表明在本路形成了由特置、常设与临遣等机构构成的三位一体分工合作的军供运作体系,同时也意味着由于中央已较之前更多地介入而扩大了本路军事财政事权。

(一)选近要特置都转运使掌“经画”之权襄助中枢决策

北宋于“烦剧之路置都转运使,如河北、陕西、河东三路,各以两制以上重臣为都转运使”。^③其中陕西路第一任都转运使的任命大约是在大中祥符九年(1016),但此时该职位的设置并非针对战时军事。^④直到仁宗朝宋夏冲突升级,陕西路都转运使的军事指向才逐渐明晰,成为战时特置“经画”军事财政事务的官员,凌驾于地方财政官员转运使之上。

自宝元年间备战西夏至庆历四年“庆历和议”正式结束与夏战事,陕西路所设都转运使虽非正三品以上的内外两制重臣,但也多为带馆阁职名的“有才识近臣”。^⑤宝元二年,时任陕西路都转运使者为工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张存。^⑥康定元年三川口之役宋军败北后,御史便建议选重望之臣入陕考察以襄助中央决策,^⑦遂使近侍重臣任陕西都转运使之职成为定制。庆历元年好水川之战前,朝廷择选天章阁待制范仲淹和刑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庞籍相继任都转运一职。^⑧庆历二年定川寨之战前,则由龙图阁直学士姚仲孙和知庆州、天章阁待制张奎相继就任。^⑨此役结束后,由天章阁待制孙沔接任处理战后事宜。^⑩这些出任陕西路都转运使的官员,其官阶可考者自从六品上的刑部员外郎到从五品上的工部郎中,并不算高,但他们此前皆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等馆阁实职。这就意味着其人一般为文学行义之高选,“往往由公卿荐引,为人主亲知”。虽然仁宗朝馆阁学士渐失上备顾问之权,但上列诸人实际上仍有议论国事之责。正因为如此,当朝廷让贴职馆阁的“有才识近臣”外任陕西都转运使时,则有增重方面事体和“存国家内外指纵之体”的政治效果。^⑪

陕西路都转运使成为宋夏三战的财政要员之始,就被主政者赋予措置陕西路军事财政事务之权,充当起“朝廷—陕西路”的桥梁,代表中央搜集前线财政情报,草拟计划,以供决策。庆历四年时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对此有过概要性的描述,即朝廷派近臣“假以都转运使之名,暂往经画。使亲视边垒,精究利害”,及时“归奏阙下”,之后“中书、枢密院仔细询问访,熟议经久之计”。^⑫简言之,陕西路军事财政决策,先由都转运使实地考察权衡“利害”后向朝廷报告“经画”之策,再由中枢首脑征询其意见并“熟议”以定方案。同时根据现有史料来看,陕西路都转运司虽在战时始终负有襄助中枢决策的军事财责,但无明确僚属与固定治所,且与后文所述临派官员只

承担一地一事之财政督办事务不同,故可用“特置”称之。

在本次宋夏战争的宋廷财政决策之中,都转运使一般都是根据亲自“经画”提建议方案,且往往能成为最后定案。宝元二年正月,都转运使张存基于对宋夏战事趋势的分析,对陕西路可利用的财政资源进行评估,初步拟定中央对陕西路的财政支援计划,很快获得许可,即“留川峡等路上供银绢于永兴军、凤翔府,以备边费”。^⑬康定元年五月,范仲淹接任张存为陕西路都转运使,立即评估三川口战败后继续主动与夏作战的军需供给可行性问题。他认为“大军之行,粮车甲乘,动弥百里,敌骑轻捷,邀击前后,乘风扬沙”,馈运的难度极大,行军途中“一日数战,进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饮,沙漠无所获”,因粮于敌或就地依托自然资源获得补给均无法实现,朝廷若要主动进攻其结果不容乐观。他根据实地调研提出的判断性建议,最终促使中枢首脑作出了暂缓对夏攻势的决定。^⑭其续任者庞籍于康定元年受命赴陕西延州等地视察“定夺所废诸寨,而边臣之义多欲固留”,他经过权衡之后建议“今已废并边小寨外,其所存皆在近里道路宽平之处”。^⑮这种注重近里纵深防御而不是前沿边地御敌的修筑城寨思路,与次年宋廷在陕西路分战区实施纵向防御策略一脉相承(见第二节所述),而“边臣之义”并未全部采纳于其向朝廷所提建议之中,表明都转运使“经画”军事财政要立足全局进行统筹安排,而并非仅仅充当本路“边臣”等地方官的“传声筒”。除此之外,庞籍还提出陕西路因战事耗费巨大,朝廷财计亦不容乐观,当下应当节用以助陕,即“今宿师西鄙,力战重伤,方获功赏,而内官、医官、乐官,无功时享丰赐”,希望朝廷“少裁抑无厚赉予,专励战功”。^⑯可见都转运使“经画”军事财政的范围虽立足于本路,但对整个朝廷财事也有所涉及,而战事后期“省费供军”政策的出台,与之所言基本精神大体一致(见第三节所述)。庆历三年定川寨一战结束,为备战御夏,知庆州范仲淹和知秦州韩琦联合上奏陕西军粮不足且遭遇饥荒事,“乞朝廷速降指挥,委本路都转运使孙沔,速相度上件州军向去救济饥民及办给军食有何次第”,^⑰亦可反映都转运使通过“相度”向中央提出方案而拥有统筹经画“办给军食”之权。

(二)本路转运使专职“奉行指挥”

在陕西路都转运使通过统筹经画襄助中央形成本路军事财政的相关决议之后,其政策落实与事务运作则主要依靠陕西路转运使来承担。他们或于战

时随军前往战事前线措置军需,或是奉行朝廷命令修城筑寨、储备粮草,一般不参与筹划本路整体军事财政事宜,在与夏三战中扮演起本路军财事务的专职“奉行指挥”者。

首先,依常制在战时随军督运军需。陕西路早在淳化年间就已形成转运使随军“部粮”往前线的常规之制。^⑩此次战事中仍然沿用这一做法。如,康定元年三川口之战接近尾声之时,陕西转运使明镐根据朝廷的安排兼任陕西路随军转运使一职,措置阵前的军需财政事宜。^⑪

其次,奉行朝廷命令与决策筑城寨和备粮草。康定元年三月,朝廷诏本路都转运使张存与安抚使韩琦以“治边要之处,余令以渐兴功,毋致伤农”为原则,制定城寨修筑规划。^⑫但其草案既成并得到朝廷批准之后,遂计划于“陕西近里诸州役兵筑延州金明、栲栳寨”,但“帅臣拥兵不即进”,不愿意参与落实相关事务,其最终得以执行,乃是“转运使明镐止以百余骑自从,分督将士,一月而成之”。^⑬庆历元年五月,朝廷为新一轮军事交锋储备粮草,命令陕西路转运司负责具体的筹备事宜,于是“转运司听商人于缘边及内地入现钱,给以香药、象牙、盐茶”。^⑭

最后,似乎不参与筹划军财整体事务。庆历二年,陕西路因战事“添就粮兵士七万人,粮赐几三百万缗”,转运司乘机“乞加详议”相关财政事宜,而得到的回复是由“三司擘画以闻”。^⑮可见,此时的陕西路转运使多不参与本路军财事务的整体筹划,而仅专职于奉行指挥之责。

(三)中央临时派遣重要朝官“督办”陕西路具体军财事务

在此次战时财制安排中,除了都转运使“经画”襄助决策和转运使专职“奉行指挥”的明确分工之外,实际还有一个由中央临派官员组成的“督办”系统。这些中央临时派遣的官员主要由言官、清要与财计等重要朝官组成,主要职责是协助都转运使与转运使等本路官员,督办陕西路修筑城寨和筹措粮草等军财急务。

首先,派遣纠弹言官、清要武臣协助陕西路都转运使措置修筑城寨事宜。如,康定元年三川口之战以宋军惨败结束后,朝廷计划增修陕西路防御工事,特诏殿中侍御史陈洎、阁门祗候王滋入陕,以“治边要处兴工”为原则,协助时任陕西都转运使张存推进兴修城寨相关事宜。^⑯其次,派遣财计要员与近臣清要主持或督促陕西路筹措军粮情况。一般而言,军粮作为军事作战的重要物资,由陕西路转运使及其

属官督办。但是,战时陕西路转运使不仅因本职工作“日为冗事所婴”,^⑰更由于战事空前而军需巨大,往往受制于有限职权而难以应付。朝廷为了不误军期,故有频繁遣使督粮之举。三川口战后,朝廷立即派遣“度支副使、刑部郎中李昭述使陕西,提举计置粮草”。^⑱好水川之战前夕,朝廷授命国子博士李宋卿入陕知耀州“催促陕西计置钱粮”。^⑲在补充军粮备战期间,朝廷亦多次遣使措施军粮事宜。如,庆历元年三月,朝廷命秘书丞蒋偕通判陕西路同州“催促陕西计置粮草”。^⑳同年十月,派遣右正言、直史馆、同修起居注梁适“往陕西计置粮草”。^㉑

需要指出的是,为了保证陕西路军事财政事务的有序运行,朝廷临时遣官用人十分审慎。入陕督办城寨与粮草诸使臣的官阶,似乎没有一定之规,既有从八品阁门祗候、八品右正言、从七品下殿中侍御史,也有从五品上刑部郎中和秘书丞、正五品上国子博士,比都转运使或转运使或高或低者皆有。但考察诸人的职事差遣,有殿中侍御史这样的掌管纠弹言事的职事官,又有度支副使之类的财计要官,更多的是国子博士、秘书丞、阁门祗候、同修起居注这样的近臣清要。这就为他们在本路军财体系中所扮演的监修城寨、催促粮运,以及直接“提举”主持军粮事宜等多重“督办”角色,提供了上下内外相维的政治保障。

概而言之,仁宗朝与夏三战时,以修城寨和备粮草为重点的财政管理主要围绕着增强中央主导和理顺运作体系而展开,主要表现在选馆阁近臣、纠弹言臣和财计要臣入陕,扩大本路筹划、执行和监督等军财权力,并在特置转运使、临遣朝臣和常设转运之间进行较为明确的责任划分,形成既有“经画”、奉行和督办分工,又在各个环节互相配合与补充的运作体系。陕西路由中央主导的三位一体的新军财体系的形成,不仅是对战事规模扩大军需激增的积极回应,而且也属当政者对军财事务运行机制的主动调适,表现出中央积极介入但仍然着眼于本路的财政管理特征。

二、增量与优化:军财供给的结构及其与战区、战略的结合

宋与夏三战之时,宋廷对陕西路军事财政的重视,除了表现为主导重置军财管理体系以加强和理顺其事权,同时也反映在配套以军物质供给的“量”与“质”的改进上:一方面立足于供应“增量”,在“主辅结合”的供军财政机构的基础上,提高财政供给的总量,增多供给品类的数量,形塑以较大额财

赋支援军事行动目标的新军供结构;另一方面着眼于模式“优化”,划分战区的轻重缓急,转向纵深防御的作战策略,呈现出优先供给“要害”战区和战区内部支援为主以提高效率的新军供理念。

(一)供应“增量”与军供结构的变化

1. “主辅结合”的军供机构。

宋与夏三战供陕军需物资的机构,本路转运司首当其冲,而从战前战时相差三倍的本路开支及“本道财赋支赡不足”的事后总结来看,^①战时军需当主要来源于中央。而中央的供给主体是隶属三司的户部上供案、盐铁部、京师榷货务等机构,当然内藏和外路转运司也是重要的辅助性军需来源。

隶属三司各机构供陕军需为主体。首先,截留户部上供案财赋。户部上供案计度管理由发运司等漕运部门编纲运往京师的诸州上供财赋。^②在此次系列战事中,朝廷则截留归属于上供案的部分陕西邻路上供财赋供军。三川口战前“川峡等路上供银绢”在运抵京师之前就被截留转运给陕军即为其中一例。^③其次,调拨盐铁部所辖禁榷收入。天圣元年(1023)陕西沿边夏军异动,朝廷就“边上诸处军粮钱帛支赡不足”的问题进行集议,所得解决办法即增加禁榷收入助军的力度,随之诏命财政大员与中枢长官统计“前后茶盐课利钱数”,^④由此让陕西路在此次战事前始终能获得解盐等处盐利换取“刍粟”供军。^⑤最后,支用京师榷货务储财。京师榷货务原本“掌受商人便钱给券,及入中茶盐,出卖香药,象货之类”,加上大中祥符二年掌交趾等国进贡珍异之物的香药榷易院并入榷货务,^⑥故其所储备财赋充足,亦要承担部分供军任务。庆历二年初,因元昊“聚兵西鄙,并边入中刍粟者寡。县官急于兵食,且军兴用度调发不足,因听入中刍粟,予券,趋京师榷货务,受钱若金银”。^⑦这是让它以优给入中成本的方式参与陕西供军。

内藏供陕军需为辅助。宋初以来的内藏作为储备财赋以备“军旅饥谨”之需。^⑧因此,当宋夏战事复起而愈急之际,内藏必然要履行“以备军国之用”的财政职责,^⑨成为供陕的重要机构之一。而主政者又有集中财权和笼络诸军的诉求,主观上也愿意向陕西路输入内藏储备的大量财赋供军。^⑩当然,从实际出资情况来看,内藏主要是对三司起到辅助作用。例如,庆历元年好水川之战结束,内藏所出“缗钱”仅被视为“助三司给陕西军费”而已。^⑪

外路转运司援陕为补充。以三司为主、内藏为辅的中央财政支给对于陕西路军供至关重要,而外

路转运司的补充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特别是它们依托其财源特色,及时地满足了军需物资的多样化需求。典型者莫过于川峡路供给军衣、江南等路支援纸甲等。^⑫

2. “三倍于前”的供军总量。

宋廷在战时不惜消耗大量财赋资源支援军事行动目标。据庆历三年权三司使事王尧臣的统计,陕西路用兵前“陕西入一千九百七十八万,出一千一百五十一万”,用兵后“陕西入三千三百九十万,出三千三百六十三万”。^⑬可见由于战事使陕西路军事财政支出上涨2200万左右,实为原来总量的3倍。其中来源于增收的近1400万无疑是三司、内藏和外路转运司的供给,其余800万也当是归属中央财司的上供与榷利等收入。其实际情况除前文已列举者,尚有如下一些代表性史实:康定元年三川口战后,为应对夏军盘旋境上所展开的新一轮角逐,朝廷随即“出内藏库缗钱八十万付陕西市刍军储”。^⑭不久又追加内藏库10万供陕军用。^⑮庆历元年好水川之战宋军再败,内藏出“缗钱一百万”,“给陕西军费”。^⑯同期朝廷亦不间断划拨本属于中央财政机构的巨额解盐榷利归陕,先以“并边九州军入中刍粟给与解盐”,^⑰后以解盐“岁课缗钱一百六十万,以计置沿边九州军一百二十余城寨刍粟,量入计出,可助十分之八”。^⑱这些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供军数目,当可旁证前揭王尧臣所言不虚。

3. “品类繁多”的供军物质。

宋夏冲突升级导致陕西路增兵,数十万边防军不仅需要粮秣,还要添置军衣被服、铠甲弓箭和修筑营房等,加之战功犒赏,所需物资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品类繁多。故“日给廩食,月给库缗,春冬之衣、银、鞋,馈输满道不绝”。^⑲鄜延路铃辖张亢,则细数战时鄜延路军需种类,有骆驼、驴骡、牛羊、红花紫草、桥瓦、鞦轡、箭翎、白毡、牛皮筋角、弓胎等。^⑳

为满足军需物资品类的多样供给,朝廷采取了商人入中、它路支援、央司拨给等方式。如,通过招纳商人入中卖“羽毛、筋角、胶漆、铁炭、瓦木之类”,并“以盐易之”,让军队获得各色兵器制造原料和房屋修建等物资。^㉑康定元年三川口之战结束后因急需补充战甲,遂令“江南、淮南州军造纸甲三万,给陕西防城弓手”。^㉒嘉祐三年朝廷诏令说陕西边地在此前自有战事(当为与夏三战)以来“诸军衣装绸绢丝皆出益梓利路”。^㉓庆历二年,朝廷为抚恤奖赏定川寨之战中奋战及殉职的将士,命内藏库拨付绢帛“以备军赏”。^㉔

(二) 模式“优化”与军供理念的变化

面对与夏作战,仁宗君臣深知国家财用有限,在增加军供的同时,还要通过切实解决军供中数量仍然有限和军资运输不便两大“难题”,优化陕西路纵深战区军需物质的合理分配并建立有效的供军途径。为此,他们尝试建立军需供给与战区轻重、作战策略相结合的模式,由此确立起以优先供给“要害”和纵深战区内部支援为主提高效率的军供理念。

1. 将“要害”战区确定为有限财力下的优先供给地。

宋夏三战之时,陕西路自东向西分为四大纵向作战区域,即鄜延路、环庆路、泾原路、秦凤路。朝廷在战前就命边臣建言陕西路攻防之重点,以便为分路军需供给提供参考。如,宝元二年向知永兴军夏竦和知延州范雍询问兵力部署意见,前者力主“以泾原最要害”,而后者认为陕西路防御状况良好,朝廷当下应加强“官军不多,土兵又少”的河东一地的防御。^⑤看到陕西路守边大臣对于战区轻重尚存分歧从而妨碍朝廷财供决策的情况,同年八月,御史建议派“重望大臣以镇关中”,尽快确立攻防重点。^⑥朝廷遂于三川口之战后命韩琦、王尧臣等人相继入陕以考察陕西路的战争形势以定各战区战略地位之轻重。康定元年,时任陕西安抚使韩琦以鄜延“复咫尺银、夏,便于巢穴”和易致夏军“出其不意,再来奔突”的独特位置,主张“宜以鄜延为先”。^⑦庆历元年,翰林学士、陕西体量安抚使王尧臣则以“泾原路接天都山,去贼巢穴为近,山川平易,可以出大兵”的有利地形,认为泾原路最为重要。^⑧朝廷认可并采纳两位大臣分别依据夏兵来攻和宋军出击的可能路线而提出的建议,遂集结重兵 13.8 万于鄜延路与泾原路,约占四路总兵力的 2/3。^⑨实际上与夏三战无一例外皆发生在此二路,说明边臣与朝廷对敌我攻防形势的整体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

宋夏交锋中攻防重点和重兵集结之地正式确立之后,陕西路财政供给的重点逐渐向鄜延路和泾原路倾斜。庆历元年,直集贤院田况上言:“今竭关中之力,耗内都之钱,才可赡延州、保安军刍粮之费。”^⑩可见此二州军归属之鄜延路此时已经成为有限军财分配的重点战区。而泾原路也同鄜延路一样在财政供给上得到朝廷特殊照顾。程龙所作专题研究指出,仁宗朝廷为充实泾原路的军事财政收入,积极开发该地区的土地资源,扩大屯田规模增加屯田收入,形成以泾原路为中心的屯田区域。^⑪本文认为,朝廷选择重点扶持泾原路开展屯田经营以供军,根本原

因就在于泾原路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而泾原一路先后承受了三战之中的好水川、定川寨两次较大规模的战事,也说明朝廷以之为财供重点的决策是有其先见性的。

2. 转向纵深防御策略以缓供军之难。

宋夏三战初期,宋军以邻路策应之法应敌,牵制敌军效果不佳。宝元二年,知延州范雍恐夏侵陕,建言朝廷“如贼入一路,即令诸路举兵以牵制之”。^⑫此议在康定元年三川口之战时得以实践。当时元昊入攻延州,知州范雍命邻路将领刘平自庆州驰援,刘平得令后“即率骑兵三千发庆州,行四日,至保安”,但四天急行军致人疲马困,又遇大雪,故终不敌夏军。^⑬而朝廷此时不知刘平已败且夏军已经离境,续令“并代副部署孙廉趋鄜延界并力击贼,仍令秦凤、泾原、鄜延、环庆部署左右援之”,故此次邻路策应也是无功而返。^⑭

从理论上讲,邻路策应之法可实现诸路相互支援,但实际上却忽略了士兵长途奔袭之苦。三川口之战后,鄜延路都钤辖、知鄜州张亢就指出邻路策应缓不济急的情况。如,“环州至延州十四五驿,直路亦不下十驿;泾原至秦凤又远于此”,救援军队抵达战场时“人马已困,欲责其功,何由可得”,故往往以“空劳师徒”收场。^⑮宋朝士兵为什么一旦长途奔袭就会出现人马俱困、士兵丧失战斗力的情形呢?这就与宋军的边防军种与军需供给有关。与夏作战的宋军以步兵为主,长在守御而不善于跋涉远征,应急救援之时自然不可能有充足的军需物质一路随运。^⑯而且从张亢所言邻路援兵到后不解困累之状可推知,他们在被救援路分与战区行军奔赴战场之时,一般也是没有办法获得沿线州军军需补给的。

针对邻路策应之法中军需供给的实际困难与效果,朝廷逐渐采用和推广纵深防御策略优化战时财政供给的方案,以改善财政供给和军事策略脱节的状况。所谓纵深防御策略,是指在军队作战过程中“不把主力分布在前沿;相反,它组成防御纵深,令敌人向国家腹地推进时受到持续的抵抗”。^⑰具体就此时陕西路的情况而言,表现为在边防纵深区域的重要军事关口修建城寨固守,以坚壁清野之法抵御夏军进攻,即时人丁度所言“谨亭障,远斥候,控扼要害,为制御之全策”。^⑱这与前沿一路一地遭夏军入侵而邻路支援策应的方法不同,是一种各路遭遇夏军侵扰的州军以相应屏障自守并由本路战区内州军支援粮草等军需的长线应敌策略。这一策略在宋真宗朝计臣梁鼎针对陕西防夏所建议的,由近里至沿边

逐级转运的军供模式中就有所体现。以鄜延路为例,“延州即东路屯兵之处,请令解、河中、丹、坊、鄜五州人户辇运粮草,仍支此五州二税于延州输送;其延州二税,即令辇运保安军粮草”。^⑧梁鼎此议因宋夏灵州初战已经结束而未能真正实行,但随着此次战事的推进,邻路策应法供军的难题全部暴露,其所肇始的纵向军供新意被配套以纵向防御策略才得以实施。庆历元年十月,即张亢上言三个月之后,朝廷“以枢密直学士、管勾秦凤路部署司兼知秦州韩琦为礼部郎中,枢密直学士、刑部郎中、管勾泾原路部署司兼知渭州王沿为右司郎中,龙图阁直学士、户部郎中、管勾环庆路部署司兼知庆州范仲淹为左司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礼部郎中、管勾鄜延路部署事兼知延州庞籍为礼部郎中,并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使、沿边招讨使”,在陕西路建立纵向防御战区,由是邻路策应法转向纵向防御法,其供军财政也必然转变为以各战区州军内部支援为主的纵向军供模式。^⑨

总而言之,仁宗朝与夏三战中财物供给的变化主要是供应“增量”与模式“优化”。供应“增量”,表现在主要中央财司都参与到供军的行列,形成三司为主、内藏辅助和外路转运司援助的供给格局,相应的军供的总量和种类有较大幅度增加,军供结构由此有明显的变化。而与此同时,国家对陕西路军事支出仍然有限,供给与军事行动脱节。为解决军供中的这两大难题以优化财政供给,宋廷按轻重缓急优先供给军事“要害”,由此确定鄜延路和泾原路为财援重点战区,又将作战策略从邻路策应法改为纵向防御法,在设立纵向防御战区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梁鼎纵向军供之意,展现了在有限财政下满足重点军事地区和战区内部自援的新理念。这就说明仁宗朝以陕西路为代表的边路军事物资供给,不但尝试跳出宋初以财政供给“量入以制出”为主的供给模式,而且试图使有限军财供给与军事行动目标更相适应。

三、理念与现实:“既增又限”政策背后的路线之争与主要制约因素

为应付夏政权的新挑衅,仁宗朝积极调整陕西路军财管理体制以重其事权,较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并优化军需供给模式。但不可否认,以中央为主体的供给数量仍然有限,有时本路与央司所给钱物只能满足某一战区主要战场的需要,这在前揭庆历元年田况所言中即有所反映。这种既要扩大陕西路供军事权并增加供应数量,又在实际上不能完全突

破有限供军的“既增又限”矛盾政策的出现,实质是在西夏立国扰边和以稳定内政为先的双重背景下,宋廷在国家财政困难与陕西“数十万兵,何所仰给”之间进行平衡的结果;^⑩同时也是由于仁宗君臣渐变“和戎为利”为“主动进攻”的对夏战略,而其又受到“轻夏”主流意识导向与裹胁的结果。朝臣对“省费供军”和“理财供军”两项政策思想进行了多方讨论,终因受制于财困现实而以前一理念的胜出结束,由此奠定了“既增又限”矛盾政策的基础。

学界对此问题已有所涉及。非治宋代财政史的学者,有的揭示仁宗朝攻守之争与反战论的发展,^⑪有的从北宋中期对辽夏政策转折的视角概括出仁、神两朝政策变化的承续性与阶段性特点,^⑫还有从军事决策的角度比较仁、神两朝对夏战役的成败。^⑬他们关注的重点集中于宋对夏政治外交与军事政策的衍变,在本问题上着墨有限,亦不成体系。治宋代财政史者,虽然对这一问题所关涉的几个重要方面——士大夫将领对军事财政政策的讨论,央地财政互动,朝廷对供军财政政策的调整等——都有关注,但还停留在战争造成财政支出激增,战争支出结构变动,战事造成陕西路赋役沉重等比较表面的层次,^⑭未能清晰地揭示其政策路线之争及其背后的历史逻辑,因而仍有详细梳理的必要。

(一)省费或理财:两条供军政策路线之争及其最终确定

仁宗朝与夏战事在陕西沿边重启前后,朝廷面临新的财政形势。一是本路军供压力激增。陕西路驻防官兵内外增置禁军 860 余指挥,约 40 万人,而“兵以食为本,食以货为资”,^⑮需要大量财赋供给。二是本路供军责任发生转移。“本道财赋支赡不足,募商人入中粮草,度支給还钱帛”,又调拨内藏财赋供给。^⑯激增的军费重担于是逐渐转移到中央度支、内藏,加重国家财政负担。在这样的背景下,朝廷不得不重新规划陕西路的军财供给政策,上下臣僚亦出谋划策,提出两种主流解决方案。

其一是以贾昌朝、宋祁和陈执中为首的诸臣,力主省费备军。宝元二年五月,天章阁侍讲贾昌朝上书言西夏已有“僭狂”之状,建议朝廷“取景德以来迄于景祐,凡百用度,靡有巨细,校其所入所出之数,约以祖宗旧制,其不急皆省罢之”,主张节用省费以备军戎。^⑰同年十一月,知制诰宋祁条陈朝廷的当务之急,莫过于“去三冗,节三费,专备西北之屯”。^⑱康定元年三川口之役结束后,同知枢密院事陈执中告诫仁宗“大役既兴,春种不入。食竭必亡,力竭必乱”,

提出“轻科率”“减骑卒”“节馈运”，以“静守”“蓄锐”之法获取胜利。^⑨

其二是以种世衡、欧阳修为代表的大臣，建议以理财扩大财源供军。康定元年九月，当亲历过宋夏战事的知延州种世衡奉命筑城青涧之时，在节约省费一途之外，另辟积极理财供应军需之法。故史载“世衡在边数年，积谷通货，所至不烦县官益兵增援”，^⑩又云“世衡开营田一千顷，募商贾，贷以本钱，使通货得利”。^⑪种世衡在边地践行理财供军之法，却未将之上升到理论认识的层面加以宣扬。在朝中颇有影响力时任馆阁校勘的欧阳修，则从战争形势、必要性和主要举措等多个维度阐说了理财供军。首先，他意识到宋夏双方的军事斗争将是一场持久战，“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为久计以挠我，我无长策而制之”。其次，强调财政是军事行动的物质基础，“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财用为强弱也”，因此不论攻守，都需要源源不断的财政供给。最后，提出理财供军是保障财源不竭的最佳方案，“通漕运，尽地力、榷商贾，三术并施，则财用足而西人纾，国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因此主张提升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而非“小琐目前之利，既不足为长久之谋，非旦夕而可效”。^⑫

臣僚们有关军供政策路线的争论持续了近两年，其间“言边事者盖以万计，皆人持所见”，主政者“益务听纳，纤悉必行”。^⑬直到庆历元年定川寨之役以宋军再败结束，仁宗与其辅臣权御史中丞贾昌朝、右正言田况、知谏院张方平、入内都知张永和与权三司使姚仲孙等商议后方才对供陕军事财政政策明确表态，确定节用爱民、裁减浮费的总方针，拟定省费供军之策，即在“宽财用，纾民力”的基本原则之下，命三司“据国用岁计之数，量入以为出”。^⑭以欧阳修为代表主张理财优先的朝臣，在知悉主政者的政策精神后，也暂时放弃如“榷商贾”之类的理财方案，转而支持节财供军的立场，故言“今虽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计无所出矣。唯有减冗卒之虚费，练精兵而速战功成兵罢，自然足矣。今兵有可减之理而无人敢当其事，贼有速击之便而无人敢奋其勇，后时败事，徒耗国而耗民，惟陛下以威权督责之，乃有期耳”。^⑮要言之，在仁宗的主导下，朝廷上下终于在在与夏两战失败后统一了认识，选择确定省费供军为陕西路军供的基本方针。

（二）冗费困局与省费供军的现实考量

财政供军路线的确定，主要基于当政者对国家政局现状的考量。宋廷之所以选择省费供军的财政

政策，一方面来自西夏立国东进扰边的国防压力和宋军屡败于夏军的外部动因，另一方面则是冗费困局难解和要以稳定内政为先的内部需要。尤其对于将“杜绝内部重大变局”^⑯作为祖宗之法的北宋朝廷而言，供军财政政策不仅要解决对夏军事行动的财政供给，更要将财政供给控制在不影响国家统治的范围内，尽可能不让供军财赋加重朝廷财政负担，防范供军需求可能导致的民变隐患。

此次宋夏战事前，朝廷应对陕西等路军事财政需求与解决本朝愈益严重的冗费困境始终交错缠绕在一起。此时大臣议论国家财困现状时，必与冗兵问题相连，并将后者视为导致前者之主因之一，进而否认为防御西夏进攻从陕西路用兵的正当性。明道二年（1033），范仲淹在上言中警示主政者：

天之生物有时，而国家用之无度，天下安得不困！……乃知馈运之患，不止伤财，其害人如此！

而当下解决之策在于“销冗兵，削冗吏，禁游惰，省工作”。^⑰景祐五年（1038），时任三司使的程琳上疏言，“天地生财有限，而用无纪极，此国用所以日绌也”，特别强调“兵在精不在众”，冗兵是造成财政短绌的重要原因，理应减省。^⑱而随着以“度支都内钱不足支月俸”为标志的国家财政困局的加深，^⑲宋夏战争不久之后爆发，臣僚们更是提出西夏问题不足忧，而“储蓄不厚，民力颇困”才是当下值得重点关注的问题。^⑳有人则直言“今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费，以困天下之财。财穷用褊，更欲兴数十万众以事夷狄，可谓无谋甚矣！”^㉑

诸大臣不仅从财政困境的因果关联之中公开否认对夏用兵的正当性，而且还以陕西兵事加重财敛可致民变隐患来凸显事情的严重性。康定元年同知枢密院事陈执中所言就具有代表性：“边兵小屈，皮肤之伤也。民力既穷，腹心之患也。凡军须出于民，夫运而妻供，父挽而子荷。道路愁叹，井落空虚。”^㉒很显然，相较于制伏西夏，财政负担加重可能引起的民变隐患，更能牵动深知国家财政困境的朝臣们最敏感的神经。而欧阳修等提出的理财供军方案固然具有吸引力，但对于此时的宋廷来说，理财助军意味着违背“量入为出”征敛有度的财政传统，转向“量出制入”征敛无度的财政新政，无疑具有更大风险。^㉓以仁宗为核心的主政者对此极为忌惮。

因此，当处于决策核心的权御史中丞贾昌朝、三司使程琳及众望老臣富弼，不断地以爱惜财力、稳定内政之说合理化他们省费供军的主张时，自然就得到了仁宗的支持而得以实施，同时也得到了其余大

臣的理解与赞同。代表性的除前述欧阳修由理财而转向省费之说,久在沿边主张广筑城寨积极制夏的范仲淹也极力为仁宗之策辩护。他的辩词核心即是社稷稳定高于一切,仁宗的保守“非志不高而力不足也,盖惧边事不息,困乏生民,用兵久之,必生他变,而为社稷之忧”。^⑤战争后期,仁宗曾令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但未改变内政优先的基本方针,亦未改变保守的军事财政供给政策。^⑥

(三)由和转战战略与“轻夏”主流意识对军供政策的影响

仁宗朝是对夏由和转战理念形成的重要时期,不仅边将和朝臣提出各种拓境主张,而且“士人谈兵之风助长主战的倾向,成为拓边主张持续发展的内在因素”。^⑦在这一理念的推动下,宋廷积极防御西夏的进攻,增强宋军实力,实施若干对策和措施,表现在对夏战略上,则是不再坚持和戎为上,而是“在战略上防御,在战术上则以攻为守,始终掌握战略的主动权”。^⑧这必然以宋廷对陕西军事财政的重视为前提。而在另一面,宋军虽屡战屡败,朝野上下的轻夏态度却仍是主流。例如,西夏此次侵宋前,富弼言:“岂我太平之世,天下一统,偶有小丑皆叛。”^⑨好水川战败,天况乃夜郎自大云:“自西贼叛命以来,虽屡乘机会,然终不敢深寇郡县以厌其欲者,非算之少也。盖以中国之大,贤俊之盛,甲兵之众,未易可测。今我师深安入,若无成功,大国威灵,益为彼轻,况或别堕奸计,以致他虞。”^⑩这与宋初以来众多朝野士人对西夏的看法如出一辙。^⑪此等轻夏态度当然会消减中央财司对供陕军备的积极性。

由此可见,宋与夏三战时的财政供给受到诸多反映时人理念与当时现实的矛盾性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一是西夏政权立国后不断向东推进,给宋朝西线带来了空前巨大的国防压力,宋朝政府不得不将原来由陕西本路所承担的军财责任逐渐上移至度支内藏等央司,而在增加军供数量之时,又因财困冗费受到稳定内政优先的祖宗之法的牵制。二是对夏理念由和转战,掌握战略主动,同时又有轻夏思想与态度。前一矛盾性因素博弈的最终结果,是国防压力逐渐让位于内政需求,由此决定了既有一开始的较大增量而后期又回归于“量入制出”原则的有限财政供给的基调。后一矛盾性因素的博弈则与前者又互为表里,共同奠定了战时“既增又限”的财供思路。在这一政策基调与思路的导引下,省费或理财供军政策路线之争也就日益向前者倾斜,最终成为此期战事中的财供国策。

此外,若跳出军事物资供给的范畴,而结合前述财政管理的调整来看,我们对这一“既增又限”的军供政策基调能有更为全面的理解。宋廷在陕西路依靠都转运使、转运使和临派官员共同组成本路三位一体的军事财政管理新体系,一方面,从其所派官员的清要近臣、纠弹言官和财政主官的身份及各自职事掌管与分工合作的机制上,我们能感知朝廷的重视之意;另一方面,从其在常规体系之外又糅杂以特置和临时派遣,以及部门分立和事权并不统一等制度安排,我们似又可感知当政者的防范之心。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扩权又限权理念,可谓正与“既增又限”的军供基调浑然一体。

四、结论

前文对仁宗朝与夏三战时军事财政的管理体系、供给模式及其背后的制约因素等诸方面情况的梳理,是利用基本史料进行事实叙述与分类概括的过程,同时也是立足于比较的视角将其放在北宋陕西路军事财政的前后发展变化中做出类型区分和整体归纳的结果。对于后者,笔者在对宋初灵州初战中的财政问题进行考察时做了初步概括:一是对夏军事战略从主守转向主攻;二是财政理念由“量入为出”转向“量出制入”;三是统筹主体从地方转向中央;四是供给模式从单一有限混合型转向多源优先专业型。^⑫通过此文的探索,我们认为这些判断仍然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而本文的价值则在于进一步揭示了仁宗时期陕西路军事财政在其前后发展趋势中的过渡性、中间性、转折性的特征。

第一,中央主导建立的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是由“地方统筹”转向“中央控制”的过渡形态。

陕西路转运使不再承担统筹之责,朝廷通过建立特置、临遣与常设三位一体的军事财政管理体系,扩其权并分其工,负责本路军事财政筹划、执行和监督等事务,特别是都转运使与临派官员多为近臣、言官和财官,表达了朝廷试图主导加强但又并非完全直接掌控本路军财管理的意图。这种由地方多司为主体和中央干涉程度加深的体制,既不同于此前主要由本路转运一司管理的“地方统筹”,又不同于神宗以后由中央直接以专司专项或统一管理的“中央控制”,可谓是二者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

第二,增量与优化并举的供给模式是从“单一有限混合型”转向“多源优先专业型”的中间实态。

陕西本路财赋不再是御夏物资的主要来源,朝廷逐渐承担起供陕诸军的主体责任,形成中央度支为主、内藏为辅的“主辅结合”财源机构格局,供给总

量为战前三倍,物资种类繁多。同时针对数量增加而总量仍然有限的现状,进行了以优供“要害”战区和各纵向战区内部自援的军供优化改革。这种由中央主导的增量与优化并举的供给模式,一定程度上保持有此前“单一有限混合型”供给模式的一些基本特征,如回归“量入制出”原则,来源与数量仍然有限,无专门供军机构等;但它又开始呈现神宗之后“多源优先专业型”供给模式的某些要素,如一开始就有“量出制入”的某种倾向,增加中央供军机构和供给数量,虽无专供机构但已有特置专官与军粮提举官,确定重点战区和分战区供给等。因而是二者之间的一种中间实态。

第三,“既增又限”的政策路线是从“内政优先”渐变至“国防为重”的转折样态。

西夏立国东进态势与由和转战对夏战略的叠加,宋廷以较大幅度增加军费总量加以应对;困冗费且恐其引起民变内乱与士人群体轻夏态度的叠加,当政者又无法突破“量入为出”的财政理念,最终选择放弃理财供军而以省费供军加以平衡。这种在前者“国防为重”与后者“内政优先”之间摇摆的“既增又限”政策路线,一方面是对此前“守内虚外”“量入为出”,即以“内政优先”的国家方针有所继承,另一方面则又开启神宗之后对夏主动进攻和以“量出制入”为原则理财供军即以“国防为重”国家战略的先河,无疑是二者之间的一种转折样态。

综上所述,仁宗朝为防御西夏的再度入侵,对宋初以来的陕西等边路军事财政管理机制、政策模式和基本理念既有所继承,又有所更易。其主要特征是在管理上仍然着眼于本路而中央又积极介入;无法突破“量入为出”观念制约致军供依然有限,但由中央主导增加供应总量并优化供给模式;理念、受制于现实需要,其平衡点从国防逐渐回归内政。这就为神宗之后陕西路御夏财政由中央统管并全面参与国家财政分配奠定了基础。易言之,仁宗朝军事财政体制改革,既适应宋夏战事新形势的财政需求,又开启神宗改革军事财政的基本倾向。而此后宋夏战局的天平开始向宋倾斜,宋廷的西向开边获得重要突破,无不滥觞于此。

此外,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从管理体制、供给模式和政策路线三个方面对陕西路军事财政新变所做的描述与比较,因篇幅限制等原因并不是全面的分析与概括,至少还有两个重要的方面需要关注。一是兵财关系,即在“制军、给食”不可通一的祖宗之法下,财事部门与军事部门之间是如何互动与配合

以提高供给效率的。从整体来看,仁宗朝在陕西路的军财运作呈现的仍然是二者分立、各司其职的状态,与宋初灵州之战时相比最大的改变是通过都转运使的考察筹划而在供军方案中采纳了一些军事将官的意见,但与神宗以后由安抚司路军事主官直接管财或统率转运使而使兵财高度融合的状态仍有很大差距。二是军资转输,即在基本交通条件并未有较大改变的前提下,军资转送是如何减少运输成本和提高运输效率的。宋夏三战中的军资运输手段与方式似乎仍与灵州初战时一样并未得到根本改进,只能通过组成纵深防御区即分区供给的办法来弥补不足,同时京师等处的外援物质主要是钱钞银两及绢帛等轻货,大大减少了运输成本。这些做法在神宗西北开边时被进一步发扬光大,如将陕西分成六个安抚司战区路分别封桩储备变换钱粮,并都“权置”转运司或特设经制财用司随军负责后勤补给,京师及远近外路支济的大量物质基本是钱钞及绢帛等轻货,由此使军资运输的效率有大为提高。

注释:

①宋仁宗朝与夏三战,历经康定元年(1040)正月三川口之战、庆历元年(1041)二月好水川之战和庆历二年(1042)闰九月定川寨之战,到庆历四年(1044)宋夏和议正式结束。而此三战之目的皆是西夏元昊谋求与宋平等的地位,且时间紧密衔接,故将之视为一个整体。参见李蔚:《试论北宋仁宗年间宋夏陕西之战的几个问题》,《宁夏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李华瑞:《宋夏关系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0~135页;吴天墀:《西夏史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71~82页。

②相关论著主要有梁庚尧:《边粮运输问题与北宋前期对夏政策的转变》,《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程龙:《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李晓:《宋朝政府购买制密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14~224页。

③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533页。后文所列官员官阶品级均据此著相应条目。

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86,大中祥符九年二月壬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971页。

⑤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34《上仁宗论和守攻备四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98页。

⑥《长编》卷123,宝元二年正月丁酉,第2892页。

⑦《长编》卷124,宝元二年八月甲子,第2919页。

⑧脱脱等:《宋史》卷314《范仲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270页;《长编》卷127,康定元年五月己卯,第3014页。

- ⑨《长编》卷 132, 庆历元年五月庚午、壬申, 第 3129 页。
- ⑩《长编》卷 140, 庆历三年四月甲辰, 第 3364 页。
- ⑪关于仁宗朝馆阁实职与帖职的相关史实, 参考李昌宪:《宋代文官帖职制度》,《文史》第 30 辑,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年。
- ⑫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 134《上仁宗论和守攻备四策》, 第 1498 页。
- ⑬《长编》卷 123, 宝元二年正月丁酉, 第 2892 页。
- ⑭《长编》卷 127, 康定元年五月甲寅、甲戌, 第 3009、3013 页。
- ⑮《长编》卷 127, 康定元年六月壬寅, 第 3019 页。
- ⑯《长编》卷 127, 康定元年五月己卯, 第 3014 页。
- ⑰《长编》卷 142, 庆历三年七月辛未, 第 3397 页。
- ⑱脱脱等:《宋史》卷 277《郑文宝传》, 第 9425 页。
- ⑲《长编》卷 126, 康定元年二月庚寅, 第 2973 页。
- ⑳《长编》卷 126, 康定元年三月癸亥, 第 2985 页。
- ㉑《长编》卷 127, 康定元年四月辛亥, 第 3008 页。
- ㉒《长编》卷 132, 庆历元年五月甲子, 第 3127 页。
- ㉓《长编》卷 137, 庆历二年九月癸亥, 第 3291 页。
- ㉔《长编》卷 126, 康定元年二月壬子, 三月癸亥, 第 2981、2985 页。
- ㉕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 8《仁宗经制契丹要略》,《丛书集成续编》第 275 册,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8 年, 第 358 页。
- ㉖《长编》卷 127, 康定元年四月甲午, 第 3005 页。
- ㉗《长编》卷 130, 庆历元年正月己巳, 第 3084 页。
- ㉘《长编》卷 131, 庆历元年三月庚戌, 第 3109 页。
- ㉙《长编》卷 134, 庆历元年十月庚辰, 第 3187 页。
- ㉚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 29《祖宗用度损益》,《丛书集成续编》第 275 册, 第 691 页;《长编》卷 161, 庆历七年十二月庚午, 第 3895 页。
- ㉛黄纯艳:《宋代财政史》,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第 13、17 页。
- ㉜《长编》卷 123, 宝元二年正月丁酉, 第 2892 页。
- ㉝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 36 之 16、17, 刘琳等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 第 6794 页。
- ㉞仁宗初年, 仍然延续前朝规定命并边九州军(秦州、延州、环州、庆州、渭州、原州、镇戎、德顺、保安)入中刍粮给与解盐, 直到庆历八年(1048), 范祥改革解盐盐法, 朝廷“罢并边九州军入中刍粟, 第令人实钱, 以盐偿之”。参见《长编》卷 165, 庆历八年冬十月丁亥, 第 3970 页。
- ㉟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 55 之 22, 刘琳等点校, 第 7263 页。
- ㊱《长编》卷 135, 庆历二年正月丁巳, 第 3215 页。
- ㊲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23《国用考一》,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年, 第 690 页。
- ㊳李心传:《建言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 17《内藏库》,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年, 第 384 页。
- ㊴董春林:《内藏财政与宋代军事政治》,《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1 期。
- ㊵《长编》卷 132, 庆历元年五月甲子, 第 3127 页。
- ㊶《长编》卷 188, 嘉祐三年十二月乙巳, 第 4536 页;脱脱等:《宋史》卷 197《兵志十一》, 第 4911 页。
- ㊷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 29《祖宗用度损益》,《丛书集成续编》第 275 册, 第 691 页。
- ㊸《长编》卷 126, 康定元年二月辛丑, 第 2977 页。
- ㊹《长编》卷 127, 康定元年四月戊申, 第 3008 页。
- ㊺《长编》卷 132, 庆历元年五月甲子, 第 3127 页。
- ㊻《长编》卷 165, 庆历八年十月丁亥, 第 3970 页。
- ㊼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 23 之 40, 刘琳等点校, 第 6510 页。
- ㊽《长编》卷 134, 庆历元年十一月乙亥, 第 3202 页。
- ㊾《长编》卷 128, 康定元年七月癸亥, 第 3028 页。
- ㊿《长编》卷 135, 庆历二年正月丁巳, 第 3215 页。
- ①脱脱等:《宋史》卷 197《兵志十一》, 第 4911 页。
- ②《长编》卷 188, 嘉祐三年十二月乙巳, 第 4536 页。
- ③《长编》卷 168, 皇祐二年二月甲申, 第 4034 页。
- ④《长编》卷 123, 宝元二年六月丙子, 第 2911 页;卷 125, 宝元二年闰十二月壬子, 第 2954 页。
- ⑤《长编》卷 124, 宝元二年八月甲子, 第 2919 页。
- ⑥《长编》卷 126, 康定元年三月癸未, 第 2995 页。
- ⑦《长编》卷 132, 庆历元年六月己亥, 第 3141 页。
- ⑧《长编》卷 137, 庆历二年闰九月癸巳, 第 3303 页。
- ⑨《长编》卷 134, 庆历元年十一月乙卯, 第 3197 页。
- ⑩程龙:《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 第 129~130 页。
- ⑪《长编》卷 125, 宝元二年闰十二月壬子, 第 2955 页。
- ⑫《长编》卷 126, 康定元年正月壬申, 第 2967 页。
- ⑬《长编》卷 126, 康定元年二月丙戌, 第 2971 页。
- ⑭《长编》卷 132, 庆历元年七月己酉, 第 3147 页。
- ⑮王战扬:《论宋仁宗朝对夏战争的军事决策及西北边防的战略转向——以定川寨之战的演进为中心》,《暨南史学》2020 年第 2 期。
- ⑯曾瑞龙:《经略幽燕: 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第 277 页。
- ⑰《长编》卷 127, 康定元年六月辛亥, 第 3022 页。
- ⑱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 39 之 3, 刘琳等点校, 第 6852 页。
- ⑲《长编》卷 134, 庆历元年十月甲午, 第 3191 页。另参考李昌宪:《五代两宋时期政治制度研究》,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年, 第 159~213 页。
- ⑳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 131《上仁宗论西夏八事》, 第 1450 页。
- ㉑李蔚:《试论北宋仁宗年间宋夏陕西之战的几个问题》,《宁夏社会科学》1984 年第 4 期;吴天墀:《西夏史稿》, 第 61~71 页;李华瑞:《宋夏关系史》, 第 37~48 页。
- ㉒方震华:《和战之间的两难: 北宋中后期的军政与对辽夏关系》,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 第 4~33 页。
- ㉓王战扬:《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的军事决策及其成败》,《东岳论丛》2019 年第 9 期。

⑦④汪圣铎:《两宋财政史》,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4~62页;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0~171页。

⑦⑤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01《上仁宗论三冗三费》,第1084页。

⑦⑥《长编》卷161,庆历七年十二月庚午,第3895页。

⑦⑦《长编》卷123,宝元二年五月癸卯,第2906页。

⑦⑧《长编》卷125,宝元二年十一月癸卯,第2942页。

⑦⑨《长编》卷126,康定元年三月庚申,第2983页。

⑧⑩《宋史》卷335《种世衡传》,第10744页。

⑧⑪《长编》卷128,康定元年九月庚午,第3043页。

⑧⑫《长编》卷129,康定元年十二月乙巳,第3063~3070页。

⑧⑬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8《仁宗经制西夏要略》,《丛书集成续编》第275册,第345页。

⑧⑭《长编》卷135,庆历二年四月戊寅,第3233页。

⑧⑮《长编》卷136,庆历二年五月甲寅,第3256页。

⑧⑯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284页。

⑧⑰《长编》卷112,明道二年七月癸未,第2624页。

⑧⑱《长编》卷114,景祐元年五月乙丑,第2676页。

⑧⑲《长编》卷115,景祐元年九月丁未,第2702页。

⑧⑩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01《上仁宗乞减省冗费》,第1082页。

⑧⑪陈均编:《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10《仁宗皇帝·宝元二年》,许沛藻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29页。

⑧⑫《长编》卷126,康定元年三月庚申,第2983页。

⑧⑬陈锋:《传统财政范式的转换:从“量入为出”到“量出制入”》,《史学集刊》2021年第5期。

⑧⑭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8《仁宗经制西夏要略》,《丛书集成续编》第275册,第351页。

⑧⑮朱瑞熙:《新兴的官僚地主阶级的首次全面改革尝试——北宋范仲淹“庆历新政”》,《浙江学刊》2014年第1期。

⑧⑯方震华:《和战之间的两难——北宋中后期的军政与对辽夏关系》,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33页。

⑧⑰李华瑞:《宋夏关系史》,第44页。

⑧⑱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31《上仁宗论西夏八事》,第1452页。

⑧⑲《长编》卷131,庆历元年二月丙戌,第3096页。

⑧⑳李华瑞:《北宋朝野人士对西夏的看法》,《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⑧㉑薛政超、岳潇岚:《灵州初战中的宋陕西路军事财政管窥》,《云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后文所叙述宋初灵州初战和神宗以后的陕西路军事财政特点均引此。

The New Changes of Military Finance of Shaanxilu in the Middl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Centered on the Three Battles of Song and Xia in the Reign of Song Renzong

Xue Zhenchao

Yue Xiaolan

Abstract: Driven by the new situation of the Song and Xia wars, the military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of Shaanxilu of the Song Renzong Dynasty began to move up, and the imperial court established a "central-local" financial supply system, making it an important stage for the integration of Shaanxilu military finance into national finance. Decision makers took the expansion of power and division of labor as the basic principles, to build a management system composed by the temporary appointment of the Shaanxilu duzhuanyunshi, zhuananyunshi, remonstrance officials, financial officials, which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management of military financial affairs such as coordin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supervision during the Song-Xia Wars. On this basis, The Duozi and Neizangku continuously increased the military financial supply of Shaanxilu and assumed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military financial supply.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combined with the "key" war zone and vertical defense strategies to optimize the military supply. The balance between national defense pressures from Xixia and the hardship caused by financial difficulties,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and the thoughts despising Xixia, they all together laid the policy tones of the financial line of "both increase and limit" and "save money for the army". The new changes in the military finance of Shaanxilu during the reign of Song Renzong highlighted the stage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nal log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litary finance of Shaanxilu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Key words: Military Finance; The Song-Xia Wars; Song Renzong; Shaanxilu